

鹿洲全集
上

脩史試筆者鹿洲欲脩宋史而
以此試其筆也古今言史者曰
才曰學曰識余謂史所難者筆
耳一筆之苟三綱以淪九法以

〔清〕藍鼎元 撰

蔣炳釗 王鈿 點校

K249
L178

鹿洲全集

上

〔清〕藍鼎元撰

蔣炳釗 王鈿 點校

廈門大學出版社

K249
L174

鹿洲全集

下

〔清〕藍鼎元 撰

蔣炳釗 王鈿 點校

廈門大學出版社

檄臺灣民人

檄告臺灣民人。土賊朱一貴作亂。傷害官兵。竊據郡
邑。汝等托居肘下。坐受摧殘。無罪無辜。化爲醜類。深
可憐憫。本鎮總統大兵。會同水師提督施。尅期勦滅。

[閩]新登字 09 號

鹿洲全集

(上、下冊)

[清] 藍鼎元 撰

蔣炳釗 王 鈞 點校

*

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福建省三明地質印刷廠印刷

*

開本 850×1168 1/32 29.25 印張 5 插頁 729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2000 冊

ISBN 7-5615-1000-4/K·181

定價:(上、下冊)28.00 元



藍鼎元(鹿洲)畫像

前 言

藍鼎元，字玉霖，別字任庵，號鹿洲。康熙十九年八月廿七日（1680年9月19日）未時出生于福建漳浦縣萇谿鄉（今赤嶺鄉）；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（1733年8月1日）辰時卒于廣州任內，享年54歲。

鼎元出生書香世家，父藍斌，祖父藍繼善，都是當地有名望的知識分子，母許氏賢惠且知書達理。鼎元自幼聰穎好學，五歲便能成誦四書五經，稍長，涉獵天文地理。

十歲時，父親“染寒疾”突然病逝，家庭棟梁斷折，平生不習農事的年輕寡母，挑起了上有七旬翁姑，下有子女的六口之家生活和教育子女的雙重擔子。她以“女紅經營家計，市蕃薯給餐飧，種蔬菜為糜以佐。”對子女親自“講授詩書，反復開導，終日不厭。”鼎元“深沉不露”，性格比較內向。但他是一個很懂事的孩子，深知母親用心良苦，感奮勵志，刻苦自立，“寧可清饑，不可濁飽”的奮進思想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已扎下了根。鼎元自幼得力母教，11歲進漳浦龜山學堂。由于家庭經濟困難，月攜白鹽一罐佐食，有時同學戲笑他，他怡然作“白鹽賦”自勵。“惟歲時一歸省祀先人而已。”全部時間用于讀書，他遍讀諸子百家、禮樂名物、輶略行陣，究心綜核不輟。

17歲時，他第一次走出縣城，從廈門泛舟出海，“溯全閩島嶼，歷浙洋舟山，乘風而南，沿南澳海門以歸。”考察了福建、浙江沿海島嶼港灣形勢，他很高興地說：“此行所得者多，人莫能喻也。”擴大了眼界，增進了不少見識，這對他以後的成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鼎元讀書善于獨立思考，從小養成關心時政，好“經濟文章”。

康熙四十三年(1704)，翰林陳汝咸出知漳浦，他是一位“饒經濟才”的有識之士。到漳浦後，治政有方，對教育尤為重視，設義學，“延諸生有學行者為師”，并“定期聚士紳諸生講五經聖理，親為剖析釋疑。”鼎元的才華受到陳汝咸賞識，“招入門下”。在名師指導下，“學所益大進”，拔童子試第一。

是年冬，進士沈涵督學三山(福州)，鼎元與他的同窗好友蔡世遠“俱受知門牆，招入使院。”在諸生中，鼎元尤受沈的鍾愛，日夜陪伴左右，“三年從游，情同父子。”沈督學曾以“國士無雙，人倫冰鑒”之語贊譽他的才華和為人。

康熙四十六年(1707)，被康熙帝稱為江南第一清官的張伯行受福建巡撫。張入閩後，對教育也極為重視，即在福州創建鰲峰書院，“延九洲一郡俊秀之士，讀書談道其中，為明體達用之學，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種。”鼎元又以學行兼優受聘鰲峰書院，參加纂訂前輩儒家著作。在院時，他用心研讀，“上自濂(周敦頤)、洛(程顥、程頤)、關(張載)、閩(朱熹)，下逮許(魯齋)、薛(文清)、胡(敬齋)、羅(整庵)”，“得濂洛真傳”，很有成就。張巡撫又以“藍生確然有守，毅然有為，經世之良才，吾道之羽翼也”，予以很高的評價。年僅28歲的藍鼎元，其才華已初露頭角，在福建已有一定名氣。母許氏因教子有方，受旌“節孝流芳”、“清操苦節”和“霜貞衍慶”匾額。

在鰲峰書院時，有名師指點，還有同窗好友可以切磋，有大量可讀書籍，這對鼎元來說，是一次發揮才華的良好機遇。可是作為一位孝子，每當他想起家中的母親和年邁的祖父母，還有年長而未婚嫁的弟妹，心里總覺得很不是滋味，於是毅然“辭養就歸”，回家幫助母親挑起生活重擔。張巡撫很舍不得他回去，曾去信和派員催他回書院，他寫了一封感人肺腑、催人淚下的《上張大中丞書》，懇切地請求張巡撫鑒諒。此後，“自庚寅至庚子，杜門耕讀十有一年”，即從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九年，也是他31歲至41歲這段寶貴時間。在這11年中，他在家中細心侍奉老人，生活困難自不待言，但

他仍不忘攻讀詩書，“歲頻困，嘗作《餓鄉記》，自廣其志，都門傳誦之。簞瓢屢空，不少挫也。”感奮勵志，頑強刻苦的自學，使得他的學識日以至臻。

康熙六十年(1721)，臺灣朱一貴起事，南澳總兵藍廷珍受詔率師平臺。這時鼎元祖父母和母親均先后謝世，弟妹也已成家，遂應族兄之邀，“參募戎伍”，充當藍廷珍高參。這時他開始步入軍政界，時年42歲。這位“戎馬書生”在臺僅一年多時間，但他對經理臺灣提出諸多精辟的政見，為時人所注目。

雍正元年，雍正帝為廣羅人才，開鄉會試，選拔品學兼優志士，貢辟雍。時鼎元剛從臺灣回來又“下第未果”。鼎元十舉科第，卻一第無緣。可是他有出眾的學識與才華，并已為時人所賞識。雍正二年，鼎元“幸以貢入京師，得辟雍”，入太和殿，進入全國最高學府。鼎元上京師不是走科舉道路，而是“奉命選拔”。三年受命校書內廷，分修《大清一統志》。這時清廷平定青海，西師大捷，為慶祝這一勝利，他獻上《青海平定雅》三篇，《臨雍頌》、《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》、《清河頌》各一篇。他的華麗文章受到稱贊，“巨公宗匠，共推有良才”，“一時聲噪輦下，卿貳慕之者，多躬身造訪，或內臣出膺封疆，輒詣府君。為條陳地方情形利病，天下師游京師者，皆爭一見為快。”鼎元在京師揚名了，因而也引起相府和皇帝的重視。

雍正五年(1727)，鼎元被相國朱軾引見雍正皇帝，他條奏經理臺灣、河漕兼資海運、鳳陽民俗土田、黔蜀封疆六事，得到雍正帝“嘉納”，遂受廣東普寧知縣，并夸他說：“朕觀此人，便用做道府，亦綽然有余。”上任一個月后，又受命兼任潮陽縣令。他致力于政務，清理訴訟、懲訴師、治盜賊、抑勢豪、毀淫祠，“政聲大振”。由于他秉公執法，不拘私情，因而得罪了惠潮道臺，被摺儼羅織罪名，“誣揭六款，裁贓千余”。鼎元蒙受不白之冤，被革職入獄。時雍正七年。

雍正八年，廣州知府明知鼎元受冤，以延修府志為名，保釋出獄。十年冬，廣東總督鄂爾達向朝廷奏鼎元受冤始末。十一年三月，

鼎元受詔進京，雍正帝親自接見他，命署廣州知府，并賜御書諭訓詩文及貂皮、紫金錠、香珠等物。鼎元冤案得到昭雪，爲急于到廣州赴任，“長途受署，不爲意”，抵任方一月，病逝于廣州任內。

藍鼎元官階不高，治政時間也不長，可在當時以及身后名氣卻相當大，曾被目爲清代數百名人之一。《清史稿》有他的傳記，尤其是在臺灣及閩廣影響更大，地方志書大都有他的事蹟介紹。道光八年（1828），臺灣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在今彰化縣鹿港鎮倡建文開書院，祀奉宋代朱子以次八人，清代只有鼎元一人。最近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擬編輯臺灣先賢先烈傳，也有鼎元其人。《辭源》、《中國歷史人物生卒年表》、《中國文學家大辭典》等，都有他的名字。藍鼎元不僅是一個地方性的人物，也是全國性的名人。

藍鼎元從一個農村的苦孩子，成爲全國性的名人，靠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和名師的教誨。他一生勤于著述，著作等身。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《鹿洲全集》中，被譽爲經濟大儒、文章巨匠，學適于世用，而志乎世道人心，心系乎生民社稷，詞不浮夸，論切人情物理。故其著作備受史家的贊賞，收入于各種藏書。《清史稿·藝文》基本上有著錄，其中《鹿洲初集》、《東征集》、《平臺紀略》具被收入《四庫全書》，《龍威秘書》、《昭代叢書》、《荊駝逸史》、《治臺必告錄》等，分別收進《東征集》或《平臺紀略》。至于單篇著作，在《國朝耆獻類征》、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》、《碑傳集》以及有關地方志書都可見到。其著作影響之廣，名氣之大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《鹿洲全集》收錄鼎元書稿八種，內容有：《鹿洲初集》凡20卷，分爲書、序、傳記、論、說、考、賦、檄、銘、箴、贊、事錄、讀傳、書後、跋、壽文、告文、祭文、哀辭、行狀、墓志銘、墓表等240篇文章，內容廣泛，是專著以外的文集匯編。

《女學》凡六卷，爲女學之專著。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寫成，在時間上是最早完成的一部專著。“天下之治在風俗，風俗之正在齊家，齊家之道當自婦人。”該書纂組古訓，大致與《小學》相近，而編

輯等較《小學》更見苦心。所謂“扶倫教之傾頽，舍此是編而奚張哉。”

《東征集》凡六卷，清康熙間臺灣朱一貴之役從軍時所作。該書通過親自實踐和考察，對如何經理臺灣提出諸多很有見地的主張，被譽為“籌臺之宗匠”。

《平臺紀略》凡一卷，離臺后于雍正元年在家鄉寫的，這是一部平定朱一貴起義的紀實文章，是為補充《東征集》之不足和糾正當時的一些錯誤傳聞而作。事關臺事，后人治臺者，《東征集》和《平臺紀略》是必讀之作。

《棉陽學準》凡五卷。他任普寧知縣時創建棉陽書院，該書是他講學棉陽書院的著作，并為書院制定同人規約、講學規儀、丁祭禮儀、書田志、閑存錄、遺學流派、太極要義、西銘要義，所謂“得濂洛真傳”。四子、六經、近思錄、小學而后所未見者。

《修史試筆》凡上下二冊。這是鼎元“欲寫宋史，而以此為試筆也”。他認為“宋史繁蕪”，必須“厘正，而欲更修之”。試筆內容是以唐代較有作為名臣，“擇其忠節，經濟之炳乾坤者，列為傳名”，凡35人，又五代一人。

《鹿洲公案》凡上下二卷，為潮普邑令時治獄紀述，列舉20多個案例，臧析疑獄，鈎致出奇。他持正無畏，疾冤如仇。史家評他“長于斷獄”，“有包孝肅復生”之譽。

《鹿洲奏疏》凡一卷六條。為履歷奏條、經理臺灣、臺灣水陸兵防、漕糧兼資海運、風陽民俗土田、黔蜀封疆，是他向雍正皇帝奏疏輯錄，內容均多見地，如遵義由四川改為貴州轄屬，就是他的建議，并立即得到批准更改。

《鹿洲全集》內容涉及到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教育、商貿、交通、少數民族政策以及文學、史學、地理學和哲學等等，知識很淵博。他的著作能得到重視，首先是他的思想觀點符合當時政治標準，他奉行傳統的儒家學說，闡發治國平天下的道理，但他又不同

于一般只讀聖賢書的儒生之輩，他事事從國家大事出發，處處以民族利益爲重，敢于堅持自己正確的主張，不計個人安危得失，故能根據當時的國情抒發自己的政見。經世濟民的“經濟文章”是他著作中的一大特色，也是他的成功之處，所以他的著作具有生命力。

藍鼎元著作中“多關臺事”，提出一系列經理臺灣的措施，爲臺灣的開發和建設作出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。在他治臺的政論中，事發于沉思，切乎人情物理，明心具性，不假外求，表現出非凡的才華與卓識。他的事迹和光華文章，史家多加贊賞。嘉慶時，嘉義縣教諭謝金鑾《蛤仔灘紀略》稱他爲“籌臺之宗匠”。《清史稿·藍鼎元傳》曰：“謂諸羅劃地更設一縣，總兵不可移澎湖。后諸羅析彰化，更設北路三營，總官兵仍駐臺灣，皆如鼎元言。”連橫《臺灣通史》亦云：“藍鼎元著《平臺紀略》，其言多有可采。”“鼎元著書多關臺事，其后官臺者多取資焉。”

此外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他極力主張開放，《論南洋事宜書》一文提出“大開禁網，聽民貿易”。《論邊省苗蠻事宜書》主張改土歸流，對待少數民族應與漢民一例“軫恤教化”，具有初步民族均等思想。尤其是對教育十分重視，他說：“臺灣之患，不在于富，而在于教”，只有“着力開導”，使人們“皆知爲善之樂，則風俗自化矣。”他提倡“興賢育才”，認爲教育關係培育人才和轉化民風的大事，而不是爲了科舉。這是一種教育爲統治階級服務的思想。他推崇程朱理學爲“正學”，爲福建閩學發展作出貢獻。他以親身的體會，強調學者務必保持“謙虛”態度。他說：“學者之患，莫過于驕矜，驕矜則善言不能入，過誤無由知。欲德之日，修業之日，進也難矣！是故謙虛二字，君子貴之。”

鼎元人生道路也是坎坷，但他潔身自愛，很重視學問和人品的統一。他一生儉樸，生活清貧，兩袖清風。他死后的棺柩還是上司和同僚出資把他運回家鄉安葬。他爲官清正嚴明，愛民、忌貪是他的座右銘。他說：“天下之官最難者莫如守令，最可爲者亦莫如守

令。”“民之父母”的地方官，就應該爲子民着想，“以其與子民最親。”要做一個稱職的守令，必須牢記并實踐“誠”與“廉”，誠者是養民與教民，實心行政，“私則不公，欲則不潔”。儉樸能生廉，淡泊可以明志。“居官者最患在沽名”，廉吏根本是不貪財，只要居官不貪財，“鬼神猶畏之”。他工作作風嚴實，注重調查研究，治普寧縣時，爲使“刑者不冤，死者無恨”，他不徇私情，嚴懲惡棍，百姓稱快。后人評說：“先生（鼎元）聽訟如神，果有包孝肅遺風”，“天下司刑之官皆如先生之公明詳慎，宇內豈有冤民哉！”

綜觀藍鼎元的一生，他不僅是清代一名大學者，一代名宦，也是一位運籌帷幄的軍事家和深明治亂的政治家，對臺灣的開發和建設有着很大的貢獻。對於這樣一位很有作爲的歷史人物的研究還很不夠，目前在國內（包括臺灣）外發表只有爲數很少的幾篇有關治臺文章。日本宮崎教授用日文寫了一本小冊子，名爲《鹿洲公案》，1967年6月由平凡出版社出版，1982年再版。臺灣周逸明先生把它譯爲中文，并改名爲《藍鼎元判案——舊中國法官判案紀錄》，1984年由金文出版社出版。

《鹿洲全集》行世很早，并屢經再版。據悉最早有雍正十年（1732）刻本，隨後還有同治四年（1865）廣東緯文堂刊本；光緒五年（1879）藍謙重印刻本；光緒六年七世孫藍王佐再補刊本，閩津素位堂代印本。最近臺灣沈雲龍主編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第41輯，收入《鹿洲全集》，其中《鹿洲初集》4本，《平臺紀略》和《鹿洲奏疏》合一本，余者五種各一本，共有鉛印精裝本10本，編號爲401—410，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出版。1989年，藍鼎元故鄉福建漳浦縣赤嶺藍氏族人又集資重印《鹿洲全集》綫裝本一套共24本。1993年鄭煥隆先生選編校注出版了《藍鼎元論潮文集》，是一本唯一有標點校注的書，爲讀者提供方便，可惜該書只收錄藍鼎元任普寧、潮陽縣令時的著作和一些有關潮州的論文。

爲了弘揚藍鼎元學術思想，進一步開展對這一歷史人物的研

究，加強閩臺兩岸學術文化交流，在臺灣藍氏族人的資助下重印《鹿洲全集》。本書採用廈門大學圖書館館藏的光緒五年版本，該版本封面右邊標有“末附鹿洲藏稿”。李秉乾先生找到《鹿洲藏稿》。該書內容有《論語》（上下篇）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（上下篇）四種。此外，藍鼎元還有一些詩篇散見于臺灣方志，過去全集均缺載。李先生根據乾隆黃淑璫《臺海使槎錄》有二首，六十七纂修《重修臺灣府志》有十首，六十七撰《使署閑情》有五首，王必昌等纂修《臺灣府志》有十首。嘉慶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有十二首。同治陳培桂《淡水廳志》有一首。1922年連橫《臺灣詩乘》有十二首。綜合各方志著錄，去其重複者，錄下十五首，并定名《鹿洲詩選》。這兩種書稿均由李先生協助點校。過去所見《鹿洲全集》收錄只有八種，此次重印增加《鹿洲藏稿》、《鹿洲詩選》二種，共十種，收錄藍鼎元著作較為完整，分為上下冊刊印。

過去重印的《鹿洲全集》都沒有標點，為便利讀者閱讀，本書作了標點和分段落，對其中一些錯漏字進行校正，并將原字用括號保留，以資鑒別。為保存全書原貌和幫助讀者理解，原書篇末所附的評述予以保留，并用楷體字加以區別。至于篇中央敘，因排版有困難，予以取消；對於有些繁體字，由于電腦字庫所限，無法完全根據原書，僅按現行簡體字排出，請讀者鑒諒！

蔣炳釗

1994年11月于廈門大學

鹿洲初集

夫夫也，少不自量，夔高爲徒，先人教之。誦法程朱，循分盡性。匪躐匪拘，從容深造，爲君子儒。長遭坎壤，牛馬馳驅。學殖荒陋，浪擲居諸。系心民物，罔顧揶揄。流離顛沛，謬學著書。兢兢寡過，惴惴昏愚。立誠持敬，寢食與俱。

試思天地之廣大，載籍之紛如，至道之弘遠，聖學之舊畬。雖假汝彭聃之歲，尚葦矻不見其有余。何半生之碌碌，至此始愧汗于勤劬。雖然，猶未也。古人寸陰是惜，既耄而好學，不渝尚及。今夙夜匪勉，庶幾乎不自暴弃，以明善而復初。

雍正庚戌嘉平朔日

鹿洲自題

重修鹿洲集跋

七世祖玉霖公著有《鹿洲全集》，行世已久。士林得之者，頗珍拱壁。自道光年間，板被白蟻穿滅，而原板散佚大半，慕者咸皆嘆惜。雖粵省前有依樣刻本，但卷數減少，字多舛錯。佐因覓購原版，再補刊其不全者，力猶未逮。茲得族伯有容助力傾貲，共費贖金，而板却成完帙。佐竊念公一生學問經濟，與吐屬詞藻，但載詩文者不同。今幸得流傳海內，蓋敬揚先烈也，于余心差慰耳。雕刻工竣，爰述俚語，以誌其略。

歲光緒庚辰桂月中浣七世孫佐謹跋

序

論者曰：文章之盛衰，因乎風氣。漢近周秦，風氣最上，至晉而降焉，六朝以下又降焉。此其說非也。

秦之時，詩書燒矣，學士殺矣，董、賈、匡、劉承秦之后，火盡薪傳，蓋皆自開運會者，于風氣何與哉？且夫障百川而迴狂瀾，此昌黎所以起八代之衰，而永叔即得之以挽五季之靡者也。丈夫之生也，將使鴻業勒鼎鐘，大名垂宇宙，坤可轉而乾可旋，而謂文章獨限于風氣耶？余讀鹿洲之文而益恍然矣。

今夫前人之學崇經濟，后人之學工文章。經濟文章，非兩途也，而后人歧之。其經濟非也，其文章亦非。余謂有掀揭之經濟，自有炳蔚之文章。皋、益、伊、周，其文章詎不冠千古哉！六經，經濟之文章也。括六經以爲文，則文章莫非經濟。西京之盛，學士大夫各專一經，類能自成一家言。江都之《繁露》、長沙之《新書》，歷久而莫能磨滅者，一根柢于《麟經》，一胚胎于《戴記》也。然而江都之文疏而未密，長沙之文博而未精。蒼萃六藝、超越諸家，惟中壘爲最。而說者謂中壘之文，考古甚精，按今未密；蓋經濟之文章，若斯其難也。

鹿洲經濟之儒，文章之匠也。其志存乎世道人心，其心系乎生民社稷，其爲文如萬斛之泉，隨地涌出，而無不逢其源，凡以摠其心志之所欲宣也。是故刊有道之碑，殉陣罵賊必錄也；表柏舟之節，投繯割股必錄也。風俗之貞淫必紀之，欲躋叔季于淳古也；形勢之要害、士馬之強弱必紀之，欲奠封疆于磐石也；海洋之情狀、蠻徼之咽喉必紀之，直欲使禹迹之所未經，莊躋之所不到，盡與享王之列也。

於戲！鹿洲一海濱儒者耳，往者臺疆之變，倚馬傳檄，經濟之文章，直須寸楮而千里肅然，彼司馬論蜀，豈足爲鹿洲擬耶？蓋醞釀經術，考乎古者無不精；而周覽世務，按乎今者無不密。起西京諸人于

今日，其以鹿洲之文章爲何如哉！若乃采《爾雅》之余，摘《文選》之艷，雖戛玉而敲金，含商而吐徵，于鹿洲之文章無當也。鹿洲胸羅山海之經，匪供捃拾；手披職方之志，不逞才華。余聞之鹿洲曰：“相如撓藻，不可登孔氏之門。”蓋鹿洲真能轉移風氣者，而文章自足千古矣。

余與鹿洲連床者三年，得遍讀鹿洲之文章，用弁數言，以附不朽。海內讀鹿洲之文者，以余言爲有當否也？

雍正四年丙午冬十有一月朔日，衡山年同學愚弟曠敎本拜題。

予自丙午都門序次《鹿洲初集》，于今六七年矣，中間光景變態已多，鹿洲學問每與閱歷俱進。丁未、戊申，見其政治卓然，若古循良。己酉遭禍，窮愁險難之中而學益大進。予讀《棉陽學準》，幸濂洛真傳猶在今日，知鹿洲之自任斯道者重也。讀《公案偶紀》，識折疑獄，鈎致出奇，駉駉有孝肅遺意焉。庚戌季夏，復會鹿洲于五羊城，則著述已充棟矣。合前《初集》，命予評薦。今又續寄附益之，予爲編輯二十卷。蓋三年坎坷，他人所不能堪，鹿洲獨視爲大塊假我進德修業之地，寸陰是惜，秉燭連宵，先聖所云“無入而不自得”，于此見之。集中所載，以有關世道人心、裨益民生吏治爲主，而雕蟲小技不足以明聖賢之道，開顛蒙之惑者不與焉。蓋道之顯者謂之文，非世俗之所謂文也。

壬子夏四月既望年同學愚弟曠敎本再題。

鹿洲初集舊序

漳浦藍生玉霖，孤苦力學，弱齡通五經。予于癸未歲試拔冠其曹，延入學署。周歷八閩，年來受知諸當路，名日著，文亦日高。己丑夏，予再游榕城，生晝夜疾馳七百里來見，同游武彝館于幔亭峰下。出近著古文詞請正。予快讀一過而告之曰：“人之有文章，猶天

地之有山水，子亦知武彝之爲山乎？兩崖壁立，一水中分，何其勢之奇峭也；三十六峰，層列于上，九曲潏洄于下，何其境之幽邃也；蒼松茂竹，名茶異卉，叢生而密布，何其色之芊綿而清麗也。是以仙靈托迹，隱士盤旋，即大儒君子亦于此卜居而栖息焉。海內騷人墨客，重趫而來，游者不絕于道。其弗獲來者，聞聲向慕，思得一覽其勝以爲快。洵乎其爲宇內之名山矣！然而封禪不及，祭告不聞，僅得比于峨嵋、匡廬、天臺、雁蕩之間，而不得列于五岳四鎮之位。其故何哉？蓋以幽奇清麗則有余，而正大雄厚則不足。天地之生物，其植體也正，則其發見也廣博而不囿于偏。其積氣也厚，則其布濩也弘遠而不局于小。五岳四鎮，惟其體正，其氣厚，故能爲歷代帝王所隆禮而敬祀，不徒供騷人墨客游覽登臨之具。武彝雖名山，不得不退處其下也。今子之文，鯨呿鰲擲，一如茲山之奇峭；剝蕉抽蛹，一如茲山之幽邃；含英咀華，鏤金錯彩，一如茲山之芊綿而清麗，其足以高一鄉一國而傳當世，夫復奚疑。顧子不自域其已至，而欲予規其所未至，則意者于氣體之間培之、固之、恢之、廓之，當必有日進于雄深浩瀚、扶餘磅礴之巨觀，視今之所造有大過焉者。于以登之清廟，獻之明堂，藏之金匱玉檢，永爲朝家之寶貴，亦如五岳四鎮，見重于帝王之廷，而不僅如今日所游，爲游覽登臨之具者。是則予所望于子，而子益宜加勉者也。”生曰：“有是哉，夫子之教我多矣！願書之以爲序。”

康熙己丑夏五月端午后三日，浙西友人沈涵心齋氏題于武彝之冲佑觀。

此己丑夏從游武彝，吾師在幔亭峰下作也。時余好爲簡潔幽峭之文，故師言云然，自是服膺師訓，縱筆所如，不復修飾。距今二十余年，音容猶在，而函丈遂成隔世，撫卷涕零，不自覺背汗之交集也。

雍正辛亥夏日鼎元識。